

河南



史志论丛

(第二辑)

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当历史的时钟刚刚敲过，社会主义祖国跨入90年代之际，《河南史志论丛》第二辑问世了。这是继1987年出版的《河南史志论丛》第一辑之后，我省方志学术理论研究领域的又一硕果。1987年以来，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一部部新志陆续成书出版，一批批成果接连涌现。截止目前，已出版或送厂印刷县（市）志21部；累计编出省志专志稿76部，占应完成志稿的82%，累计编出市、地、县志稿120部，占应完成的90%。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其它方志理论研究专著、文集、工具书、资料集、期刊等几十种，这是河南修志史上空前的壮举。

与此同时，全省的方志学术理论研究也极为活跃。从1987年至1989年底，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地方史志协会及各市、地、县志编委会、史志协（学）会，多次组织和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活动，包括召集各级各类志稿评奖会、专题讨论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等。除会议研讨外，全省广大史志工作者还在方志编纂实践中，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他们辛勤耕耘，任劳任怨，排除干扰，刻苦钻研理论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在各种史志刊物上发表，为提高新志书的质量，推动我省方志学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河南史志论丛》第二辑的编辑成书，正是在这一良好基础上进行的。

1988年，省地方史志协会为配合全省修志工作开展，确保志

书质量，连续组织召开了两次全省史志学术讨论会，3月初在郑州市召开了省地方史志协会第四次方志学术讨论会和10月份在平顶山市召开了河南省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两次会议共收到史志论文近200篇。会后，应全省广大史志工作者和研究人員的 要求，我们曾准备将这些论文整理汇集成果，但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89年3月，在省地方史志协会全体理事会议上，许多理事纷纷反映全省史志工作者的愿望和要求，希望能采取积极措施，想方设法汇集、保存我省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为修志工作服务。之后，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各修志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和拟定了出书办法，发到各地、市征求意见，得到了信阳、南阳、鹤壁等地市史志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配合下，省地协迅速组织了编辑班子，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编辑任务。

这部论丛共收文章112篇，约45万字。主要是从1988年省地方史志协会召集的两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中精选而成，也收入了近几年我省广大史志工作者、研究者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部分优秀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内容广泛，观点新颖、实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所论课题包括方志的功用、新方志的编纂原则、指导思想、“政治活动”及“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新方志中的地位、写法；新方志的体例结构，怎样突出地方特点，提高志书的科学性；提高质量问题，以及各专志的编写、志书总纂方法、主编的作用、方志工作管理、图照运用、文字加工、出版校对等；还有关于河南重要地方史事，人物的考证、研究，民国时期农民自发武装及社会问题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省史志理论研究的新水平、新动态。

《河南史志论丛》第二辑的成书，不仅是河南省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大检阅，而且标志着河南方志理论研究发展到新的阶

段，充分显示出河南方志理论队伍的形成、壮大和成长。它必将为推动全省修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提高新志书质量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前不久，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全国政治局势日趋稳定，社会安定团结，这为编史修志工作的进一步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广阔的前景。“岂容明月沉天去，还教江涛动地来”，值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对多年辛勤笔耕在志坛上的史志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并祝愿你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为借鉴历史，反映现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子孙造福，为万代服务。

李之放

1990年1月10日

目 录

前言 李之放

新方志编纂研究

以中央两个“决议”为准绳，编纂好《中国共产党志》(篇)

..... 李振华 (1)

喜看硕果压枝头——河南省修志工作九年简述 杨静琦 (7)

谈志书编修中的几个问题 樊凤梧 (11)

编纂新方志的根本原则 朱尊生 (18)

要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修志 陈百奇 (22)

新方志应努力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史定训 (29)

谈新方志的创新 张贵照 (33)

方志的纂修当以资治为宗旨 郝奇 (41)

浅谈方志编纂工作的行政管理 张荣华 (43)

对省志中纵横统筹问题的几点看法 陈守强 (48)

《信阳地区志》体例探索 胡捷民 (52)

《南阳市志》如何突出城市特点 史定训 (58)

浅谈中、小型城市志如何体现城市特点 赵莉 李国忠 (63)

如何编写省(市)志中的《城建志》 李彤 (74)

《城建志》如何记述改革开放 李彦升 (78)

论山水寺庙志的纂修价值 文忠 汪蔚 (83)

县志出版后如何使修志工作走上正常化 徐启明 (90)

试谈新方志的科学性 郭正 李双英 张春国 (94)

论志书分类的科学性 赵景才 (100)

突出地方特点探微	封太运	(104)
方志“突出特点”辨析	卢成岳	(109)
试论志书的条目式结构	董文安	(114)
条目体与编章节目体利弊析	朱中馥	(120)
试谈志书各门类的内在联系	王鼎森	(124)
志书的横分要遵守逻辑规则	文 汇	(130)
论概述的结构与编写方法	李德胜	(136)
关于新志书的概述	崔自贵	(146)
浅谈加强志书的宏观记述	王 芳	(151)
志书“概述”及篇(章)“序”	王静远	(155)
谈方志“小序”及其编写方法	谭国友	(159)
关于“革命斗争纪略”的浅见	滕凌飞	(166)
谈谈县志设立“革命根据地”专卷问题	张旺增	(172)
浅议新志书如何反映苏区	吴富和	(177)
《对新志书中有关‘苏区’拟题的异议》的质疑	庄以贵	(181)
新志书中如何正确记述“文化大革命”	张泽霖	(185)
地方志与廉政建设	董文飞 张克明	(193)
在志书中记述党代会应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色	吴启福	(198)
新方志必须重视记载统战工作	王洛山	(203)
修志与统一战线工作	史其显	(207)
编写《西峡县志》的两点体会	李玉改	(212)
编写政治编之管见	刘瑞全	(215)
设置《综合经济志》是时代的需要	焦从贤	(217)
试论农业志的线条结构	王明聚	(227)
关于编撰农业志的几个问题	赵 魁	(232)

《南阳畜牧志》编写体会	柏卫平	(238)
编写《财政志》的几点体会	任世杰 辛之鑫	(242)
新编地方志要弘扬民族文化	和玉琢	(248)
浅议城市志中“人口”与“劳动就业”的编写		
志书中“婚姻家庭”的编写	桑朝凤 王卫明	(265)
试论县志人物的分类与编排	谭秉全 郭云莲	(273)
县志人物编纂琐议	张友仁	(280)
浅谈新方志中人物传记的编写	熊凤舞	(286)
人物传应具备“六性”浅谈	晏慎钧	(289)
写历史人物如何借鉴旧志资料	高继先	(293)
方志中图象的由来及图表的运用	王静远	(298)
谈新县志的统计图表	郑永立	(304)
图表在新方志中的地位与应用	郭聚山	(310)
入志照片质量琐议	李新生	(316)
试论新方志的语言特性	艾廷和	(320)
试论新编方志的语言	赵莉 李新中	(327)
谈谈方志的模糊性语言	杨树礼	(334)
谈县志总纂的素养	柳俊宏	(338)
试谈县志的总纂工作	赵光华	(346)
县志总纂“六忌”	王遂贵	(352)
县志总纂拾零	王本庆	(356)
认真修改 提高志书质量	程希才	(360)
志稿修改小议	晏慎钧	(364)
谈《汤阴县志》的总纂和出版	殷时学 张鸿庆	(367)
寡者劳而众人受益——巡回辅导办法好		
	周口地区史志办公室	(374)

发挥校对在修志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王少云	(376)
校对《汤阴县志》后的一点体会	曹瑞相	(379)
浅谈志书的资料长编	任行明	(384)
修志育人	李耀曾	(388)
由《濮阳年鉴》说到地方志	王文学	(393)

民国时期农民自发武装及会社问题研究

谈民国时期(20—30年代)河南“土匪”问题		
.....	陈传海 刘翔南	(396)
关于民国时期“土匪”的称谓问题	郭云莲 谭秉奎	(407)
民国时期的土匪	许竟成	(414)
关于土匪性质的探讨	王忠忠	(420)
略谈豫西土匪	张靖海	(425)
“老洋人”与河南自治军	张显明	(432)
解放前夕淮滨地区的匪患成因及其特点	刘凯	(442)
惯匪岳岐山长期为患原因	罗开明 黄明远	(446)
试析李克邦部覆灭的原因	黄炜	(452)
从邓雨霖其人看有关土匪入志问题	杨智义	(457)
赵青山其人	岳长宇 陈丰臣 韩忠贵	(463)
王太事略	何朝太	(468)
吴仲英发迹史	徐启明	(474)
试析匪首汪怀泌的一生	栗文飞	(478)
土匪、汉奸司华生的罪恶一生	尚庆恩	(483)
试论邓县民团	王复战	(490)
豫北浚滑汤天门会	浚县地方志总编室	(497)
试论二战时期信阳地区的红枪会	李德胜	(506)
信阳红枪会始末	常护国	(511)
息县红枪会的兴起及其发展	戴金瑛	(521)

- 1926、1927年安阳红枪会 孙晓奎 (530)
漫谈潢川青红帮 李昕 (534)

地方史专题研究

- 殷墟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贡献 王世恩 (537)
墨翟故里考辨 郭成智 (542)
西平古冶铁遗址的新发现 董文安 (552)
罗贯中——许贯忠和鹤壁市郊许家沟 姚仲杰 (557)
朱载堉和他的时代 李益林 卞师军 (574)
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与成就 刘炎 (584)
从冯玉祥在鲁山的两件事看其施政思想的人民性
..... 郭成智 王之延 (594)
伊洛区抗日根据地述略 全建勋 (598)
谈民国时期固始县的苛捐杂税 杨传乐 (605)
大伾山古貌新证 王法星 (609)
嵩阳书院兴废考 杨清禄 (615)
函谷关考略 贾同然 (621)
我国第一所古军校 常永海 阎玉生 (627)
于毒及于毒寨 李清堂 (632)
漫话濮公山 裴世海 (634)
齐魏马陵之战在范县 邢奇凤 (638)

附录:

- 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第四次方志学术讨论会征文目录 (部分)
..... (640)
河南省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征文目录 (部分) (643)

以中央两个“决议”为准绳 编纂好《中国共产党志》（篇）

李振华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如何编写好中国共产党志（篇），是修志工作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尚无成熟经验可资借鉴。近几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对编纂“中国共产党志”，在理论与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已出版的志书或基本定稿的志稿看，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但是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怎样写好执政党及其领导核心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等。有的志书对中共组织机构沿革、领导人变更、基层组织、党员教育、纪检、统战等工作记述较多（这是必要的），对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及重要决策、党管干部工作记述较少；有的对建国后前17年的成绩记述不足，对失误反而记述较多；有的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记述较充分（是应该的），但对这个时期工作上的失误没有或很少提及。总之，对党的领导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党的丰功伟绩、前进中的挫折与失误记得不够完整、不够全面，不能反映历史发展兴衰起伏的全貌。

中国共产党志（篇）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放到重要位置，高水平、高质量地认真编好。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她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领导各族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胜利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和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呕心沥血，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进行了伟大尝试，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作出巨大贡献，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探索和前进道路上也遭受到挫折和失误，对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一经发现和认识了，就遵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主动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表现了一个真正马列主义政党的光明磊落。这样一个光荣、伟大党的丰功伟绩应该在新志书中大书特书，切实把中国共产党志编好，这是修志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为主线，编好中共志（篇）。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

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正确的路线、政策是革命与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的路线正确，并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革命与建设事业发展就顺利，成就就大；反之，什么时候路线政策和指导方针上出现偏差、失误，革命与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党的路线、政策是决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盛衰成败问题。因此，编写中国共产党志，最重要的是记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情况和党在政治、思想、组织整体上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中央“决议”为准绳，去衡量是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本地区党委是怎样贯彻执行党的各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领导重要决策实施结果。既要把成绩写够、写充分，又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恰如其分地把失误简明扼要地点透。要坚持“两分法”，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失误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党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写失误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能写得过细，更不能写得漆黑一团，不见光明。就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失误，在那一时期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如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作为政治运动是全面否定了，但这个时期的历史没有中断，党的事业没有中断。广大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坚持维护党的领导，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培育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干部，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为党工作，使党的事业没有中断，仍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所以“文化大革命”10年中的成就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不应回避。要抓住事业发展前进，成绩是主流这个根本问题，准确、客观、全面地写出本地区的特色，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真貌。至于采取什么体裁能更好地反映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效果，黑龙江省“中共志”采取史志结合体，前史后志，前三篇是史体，以史实依时竖写，后两篇以志体横分门类。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不便横排记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问题，分历史时期依时竖写。这是编写“中共志”的一个新尝试，有的县志中共志篇中增加了“党的重要活动”等篇目，弥补了对党的重要领导活动记述之不足。但对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领导活动、领导作用究竟怎样记述为好，尚未完全解决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实践。

“党的重要会议”是“中共志”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党的代表大会更应该写好。记述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会议指导思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形成的决议、确定的指导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作用影响如何等方面。抓住实质性问题，分清正误。不能只记什么时候开个什么会议，参加人数，通过什么决议，选举结果。更不能照抄历史文件，使人看不出会议的指导思想、决定的问题是正确与错误，作用影响怎样？如何记述会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方法，很值得仿效。如“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路线的出

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这样记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很完整、全面，观点明确，正误分明，用正确的观点统帅材料，材料说明观点，很自然地把观点与事实熔为一体，达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灵魂，是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编纂出版新志书，一定要把好质量关，特别是要把好政治关，确保政治上无错误。但在实际编写政治运动时，分寸难以掌握，有的似有客观主义的记述，观点不够鲜明，褒贬不甚适当，该否定的没有明确否定，是非不清。对旧政权统治者的活动，必须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有分析、有鉴别地记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以中央“两个决议”为标准，去衡量是非，观察处理编志中的问题。反

对什么，弘扬什么，旗帜要鲜明，观点要明确，正误要分清。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既要防止对历史资料不加分析、鉴别，不经过筛选加工整理就照抄照录，又要防止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犯的错误）。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及历史上形成的政策思想，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下进行分析和评价。不能不看历史条件、背景，以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过去的历史，更不能以个人好恶去记述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编纂出象邵文杰提出的“政治上无错误，材料上无虚假，内容上要完整，文字上要精练”的高标准和科学的、严谨的、高质量的新志书，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无愧后人。

喜看硕果压枝头

——河南省修志工作九年简述

杨静琦

1982年春节刚过，我们冒着料峭的春寒，驱车到河南省第一个开展县志编纂工作的县——浚县，总结他们的经验，研究修志工作如何起步。时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吴贵增同志（现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濮阳市委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介绍了修志经验，并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踏遍青山布芳草，笑迎硕果压枝头。”光阴似箭，转眼之间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已进行了九个年头。经历了九个寒暑之后，应了吴贵增同志的预言，1989年，河南省的修志工作已开始进入成批出成果的阶段，正是喜看硕果压枝头了。这是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修志工作的结果，是全省修志工作人员奋力拼搏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是继承中华民族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上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斗争的中心，形成有安阳、洛阳、开封三大古都和南阳、商丘、济源等历史文化名城。地方志的编纂历史悠久，东汉《南阳风俗传》是河南第一部地方志书，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史。其后，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元，在河南三大古都畿地和四周郡、县，有数十部“耆旧传”、“风俗传”、“地记”、“图经”等地方志书编纂刊刻。至明、清、民国，代代修志，且各州、县普遍开展，有资料可考的河南省、府、州、县志约有上千种，但因战乱和灾荒散佚殆半，现存仅56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修志，1958—1960年，曾开展编史修志工作，但因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和3年自然灾害，经济暂时遇到困难，修志工作停顿，当时全省写出县志稿70多部，虽未正式出版，但保留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提出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而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发布文件，推动全国修志工作的开展。河南省在全国修志工作的大好形势下，做了相应安排，使此项工作步步深入，层层展开。这届修志工作规模之宏大，发动之广泛，搜集资料之丰富，编纂经验之发展，方志功用之发挥，修志工作对社会影响之深远，均是历代修志所无法比拟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要继承传统，但更是新兴的事业，重在创新，尤其是在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方面要创出崭新的水平。回顾修志工作九年，河南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0年开始准备，1981年2月9日，省委书记刘杰批复了第一个修志工作报告；1981年10月17日，省委发布文件，批准建立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改名为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之后，召开了成立大会，向全省宣布修志工作的开始。1982年为组建修志机构的一年，提出建班子、安摊子、要票子（修志经费）。各地、市、县和省直各厅局及中央驻郑有关单位，基本完成了修志机构的组建，共